跨学科对话与争鸣：神经科学与人文学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2.03.261

“神经历史学”是否可能？

孙　仲[1]　张文喜[2]
(1.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2.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人文学科历来有从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中汲取灵感以拓展思路的习惯。但这一次，来势凶猛的神经科学对人文学科的冲击可能会彻底动摇我们认识人类的本性和历史的概念框架。然而，即便主张史学现实主义，也不必接受这样的“神经历史学”。因为人类历史的主体只能是人和国家，而不可能是大脑或神经系统。我们生活在整体人的层面，任何以单独的身体器官代替整个人的做法都会使命题失去意义。让大脑接管心灵或人所执行的机能，看似坚持了彻底的唯物主义，但会使大脑成为某种心灵化的存在。实际上，人所独有的行为并不是因果决定论式的，而是目的论式的。即便人类能感受到各种内外压力，也不是像物那样被彻底决定的，而是会统筹考虑和谋划自己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存在的，而且不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减少，反而会日益增多，并且因此给予了人类历史行动以意义。

[关键词]神经科学；历史学；自由；主体

Is "Neuro-history" Plausible?

Sun Zhong[1]　Zhang Wenxi[2]
(1.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2. *College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New developments in natural sciences have always been both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hallenges to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neurology has produced much spillover that permeates studies on humans, creating many new disciplines with the "neuro-" prefix. Do we expect that a "neuro-history" will appear in the near future and occupy a predominant place in historiography? History is about the story of humans. Its subject is human being, and its content concerns human thinking, feeling and action. Neuro-disciplines of humanity, however, tend to think that all of the thinking and feeling in daily life are wrong or simply "illusions," for they depend on superficial "folk psychology." Important things happened only at the neurological level, so there is no mental substance or subject. The subject in history is the brain, or the cerebral subject. The genetic structure of the brain has decided how humans think, feel and act. Therefore, freedom is also an illusion. If such a neuro-history finally prevails,

[收稿日期]2012-03-26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2-06-2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作者简介]1.孙仲，女，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2.张文喜，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

it will bring about fundamental changes on the self-understanding of humans and their history. Generally speaking, thi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threat of naturalism to humanity. The response from humanities, however, does not have to be flight into mysterious realms. Realists agree that human history lies in solid nature. However, even as realists, we do not think neuro-history is an adequate research programme. The subjects of history can only be humans and nations, rather than brains or neuro-systems. Life goes on at a holistical level. To try to use any part of the human body to replace the whole man will make statements in historiography senseless. Moreover, one reason for our rejection of replacing mind with brain as the agent of history is that brain is a physical thing and so cannot live in a narrative or teleological way. It falls within the realm of cause and effect. Thus, if brain takes over the role of the mind and becomes cerebral subject, it will not lead to realism, but will re-enchant nature. This will be shocking to many scientists, because the disenchantment of nature has been achieved by scientists only a couple of centuries or so, with difficult struggle against the long religious tradition. Furthermore, human action is not cause-effect determined, but follows a teleological pattern. Even though we are often under serious pressures of various kinds, we are not "determined" like a thing. All the pressures will become concerns in the human mind as he or she "cares for" or plans future actions. Therefore, freedom is always there. As a matter of fact, it grows more and more in the world, which provides "meaning" to our pursuits in history. In fact, sentences and language acquire meaning only in certain forms of life. Therefore, "Subject," "freedom" and "soul" are meaningful expressions, rather than "illusions," in lif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naturalism led by neuroscience has been invading life-world with their particular languages and perspectives. This can be interpreted by the gradual predominance of commercialism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ity. Max Weber has predicted the future of human history as modernity deepens. Neuro-history or neuro-humanities may just reflect this trajectory. The question for us is: are we ready for this destiny?

Key words: neuroscience; history; freedom; subject

毫无疑问,自然科学已经在飞速发展的脑科学(神经科学)的率领下向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进军。脑科学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和教育学等各学科,神经元经济学甚至被有些学者称为下一代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之一[1]223。20世纪以来,经济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日益呈现出某种"帝国主义"的强势地位,其一举一动经常被其他学科模仿,这一点只要回想20世纪理性决策论和博弈论进入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盛况"就不难理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神经科学的方法论不久将通过经济学强势渗入整个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学中?人们是否可以展望"神经历史学"在不久后诞生?

史学一直对其他学科的方法论很敏感,经常运用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新研究方式发展出某个新史学流派。具体而言,史学家们一直受益于生理—医学乃至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比如皮埃尔·阿考斯等人就从国家领导人的疾病,尤其是脑部疾病的角度入手,探讨其对人类历史

进程的影响①。科学在不断帮助史学家对人性进行深入理解。正如罗蒂所说，新的知识发展能够丰富我们思考和讨论的方式[2]323。但是，神经科学方法论进入历史学之后能否发展出一个“神经历史学”学派？这个问题的本质并非“史学”中是否能够和应该增添一个视角，而是“真正正确的视角”是否会占据主导地位并彻底取代所有其他视角，因为人类生活的实质与真实发生的处所正在被神经科学第一次揭开。此前的生活都是幻象，对它的记载、描述和解释都是人类知识处于幼年时期的无害游戏。一旦人类科学发展成熟，这些游戏就应当结束了。

这样的观点其实或明或暗地被近几十年的神经科学、心智学中的主流立场——某种广义的“自然主义”立场所主张，从心智家如丘奇兰德、丹尼特等到大多数脑科学家都是如此。他们的立场触及到了史学的基本预设，比如究竟谁是历史中的主体(subject，agent)，历史有没有意义，等等。从脑科学出发的人类本性观和历史观必然主张：不存在独立的心灵实体，没有主观意识。意识只不过是大脑的机能，故而是客观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3]。我们所珍惜的经验世界的本质不过建立在粗陋错误的“民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之上而已。不难想象，这样的“新思维”已经构成了对史学的基本概念系统的挑战，史学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回应。

本文只是对此的一个初步反思。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反对自然主义，并因此质疑“神经历史学”的可能性；但并不认为人文学在遇到科学的“挑战”时应当遁入某种“玄学”当中加以躲避。史学并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一个史学工作者只能立足大地，去面对客观的经济和政治的经验性事实。本文认为，即便从现实主义史学的立场出发，也不能同意神经科学对人类历史的理解，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看，神经历史学或许又可以说是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一、现实主义与认同

还原论的神经科学立场可以用斯瓦伯教授著作的题目来概述：我们就是我们的大脑(《我即我脑》)。这个命题的新意显然在于针对其他认同，比如“我们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是我们人本身”(作为心身统一体)，“我们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是我们传统的传人”，等等。

相对于这些耳熟能详的认同表述，“我即我脑”这种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新认同是否成立？笔者认为，在人类生活和历史领域中推广这样的认同会带来混乱。新的理论会取代旧的理论，这不奇怪，但这一新认同所影响的将不是旧理论，而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心智学中一直有采纳这种新认同的倾向，而反对者则指出，这样的新表述会对日常语言造成破坏，使其从根本上失去意义。由著名的生理学家贝内特和哲学家哈克共同撰写的《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集中论证了这一点：我们的语言服从一定的用法规则，它与我们接受什么科学或理论并没有关系，新的科学或理论的出现与消失都不会影响它。而我们的学说如果破坏了语言规则，就会出现无意义的词句。概念上的问题不能靠实验来决定，因为实验决定的是真假，而不是意义的有无[4]406。就我们的认同而言，我们服从的是“我们是人”或者“我们是 X 国”的语言规则。笔者认为贝内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在人类历史活动的领域中，说“罗马帝国正在威胁日耳曼部落”是有意义的话，但说“罗马人的脑区 C 正

① 这样的著作颇多，比如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到分析与批判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Yan Jianqiang & Wang Yuanming, *Western History Philosophy: From Speculative to Analytical and Critical*,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7.]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Du Weiyun, *Historical Methodolog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法]皮埃尔·阿考斯、[瑞士]皮埃尔·朗契尼克《病夫治国》，(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P.Accoce & P.Rentchnick, *Those Sick Who Govern Us*,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1981.]

在威胁日耳曼部落”就没有意义(不是假句子,而是无意义的句子),因为它犯了“部分论谬误”。以修昔底德和米尔斯海默、华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学说绝不是唯灵论的,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发生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实力变化和相应的博弈就已经是足够的因果解释,这样的解释不涉及脑区或者神经元放电的层面。实际上,向上的解释即从更大的国际结构入手的解释,也能导向“我们就是我们的世界”的认同。尽管大国格局影响了国家行为,但“世界认同”也只能在启发(heuristic)的意义上说,而不能真的当做一种认同。

脑科学家的认同观必然导致的倾向是贬低心灵和意识,强调从人体器官及其机能(属性)的关系角度看待心灵或意识,并进一步由此得出强决定论,否认自由。然而,史学中的现实主义者尽管倾向于承认强因果决定论,但其形式并不是生物学家所主张的那种直接决定论,而是必须纳入人类特有的“目的论”模式中。直接决定论确实不需要意识的介入,不仅物理化学层面的因果关系如此,甚至动物界的因果关系也是如此。即便高级动物比如猿猴,很可能也仅仅是 zombie(心智学术语,指没有任何意识状态的生物),即其“脑内”可能并不具有任何觉醒意识。动物的生存与进化涉及许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良好的生存和进化性状的基因在复杂的环境和行动中如何得到识别和复制等,一着不慎则个体乃至种族的进化过程就此中断。然而动物完全不“知道”、更不会“筹划”完成这些任务,它们没有那么大的使命感。它们的反应和行为的“背后”是否有起码的意识和 qualia(心智学术语,指“感受质”)都还是可以存疑的预设。但生物学研究并不需要这些预设,它可以绕过“黑箱”,只通过行为主义的输入输出就可以解释所有问题。这也可能是生物科学家普遍看轻意识重要性的原因之一。斯瓦伯等论证了人类的许多机能可以无意识地完成,弗洛伊德很早也提出过类似的观察结论。

但人的行为与动物行为具有本质的不同。让我们以第一个表达自己的现实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为例。他笔下的人物经常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讲,这个特点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演讲词大多是修昔底德本人撰写的。既然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相信历史行为是类似于物理运动那样被决定的,为何他不满足于描述可以观察到的客观物质力量对比的变化及相应的反作用,而要通过连篇累牍地撰写这些“无足轻重”的心理活动去揭开黑箱?笔者认为,这表明修昔底德意识到“黑箱”中的事情绝非无足轻重。人类即便感到物质力量的压力,也要将之纳入自己的目的论考虑中,并且最后作出自己如何行动的决断,才能使一切具有“意义”。“这个情况让我们不得不选择 X”与“根本不用我们考虑是否选择 X,脑和手会自动去做”表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也正因如此,所有国家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雅典帝国主义的代表在侵略米洛斯时说:“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足为怪,与人性也没有相悖之处;如果我们确实接受了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帝国,而且不肯放弃它的话,那是由于某种原因三个最强有力的动机所驱使,即恐惧,荣誉,利益”[5]40。这话貌似主张被彻底决定的宿命论,但整个语境表明,雅典谈判代表的主旨并不是否认自己的自由和躲避责任,而是自诩强大有力。

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问题。人文学者和大众每当遇到科学“揭示”真实世界的情况时,都习惯性地退向爱情、情感、快乐、痛苦、艺术、意识、个体性、价值等等,坚持说这些无法被硬科学所量化研究。然而,为什么“不能被严密科学研究”的东西就恰好是“重要的东西”?科学家可以宽容地说:我们没有否认这些东西(暂时)无法被严格量化研究,然而它们只是真正重要事情(比如种族的生存和进化)的副现象、被决定的结果和附带产品。至于通常我们感受到它们对我们的吸引力很大,那只不过说明人类确实经常受制于幻象的力量而已。对这一思想最早的系统而经典的表达是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拴牢囚徒的钉子其实就是爱情、情感、快乐、痛苦、艺术、意识等等个体性的价值,其力量极为强大[6]232[7]46[8]58。哲学家和科学家经常是理论上的盟友,他们共同反对历史学家的洞穴人生。但是,人类历史只能在所谓洞穴中进行。

二、尼布尔：更为复杂的现实主义怎么看

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涉及道德。人文学对科学还原论的反对包含着来自道德和价值上的考虑。一般来说，人文学钟情于道德价值，而科学因为坚持价值中立，其“冷酷”结论似乎总是在威胁道德习俗，这造成了科学和人文学长久的对立倾向[9]18，达尔文学说遭到宗教界的激烈反对就是一个例子。然而，这一次以神经科学为首的自然主义人文学有一个特点，即认为新的科学发现和过去有很大不同，许多结论都有利于道德伦理的建设。神经科学固然揭示了人有自私脑区，但也揭示了人有道德脑区，如高级皮层、镜像神经元等，故而可以支持道德所需要的普遍同感，可以说明“合作”的起源，进而还能说明罪恶源自生理毛病（如大脑中催产素分泌过少），从而找到真正有效的治疗方式[1]338，358[10]。

然而，我们认为这样的思路还是低估了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辩证性。在人文学学者中，确实有人会赞成神经科学的道德学思路，比如柏拉图。他的心灵三分法与脑科学对大脑的三分法几乎可以完美对应：大脑皮层对应的是理性，外缘系统（所谓哺乳动物脑）对应的是激情，脑干（所谓爬行动物脑）对应的是欲望。于是，不道德来自爬行动物脑太发达而大脑皮层发育不成熟，从而欲望不服从理性即皮层颞叶的指挥[1]275[3]88（这颞叶也可以是“外挂颞叶”）。低级脑战胜高级脑意味着欲望战胜理性，这就导致邪恶战胜了善。但这样的解释是不是太完美也太简单了？更为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想家比如尼布尔等主张在考察人的本性和历史时采取更为复杂的视野。他们指出：柏拉图的描述并不符合人类历史及其本性。人类的自由意志并非仅仅是善的来源，事实上它也正是人类犯罪的根源。人类之所以犯罪，就个人而言是不懂得自己的有限性本质，不懂得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于是傲慢地征服一切）；就与和他人的关系而言是企图自封为神，把一切非我的事物看做是工具性的物[11]47。用今天神经科学的术语来说，人类的善与恶其实都发生在同一个脑区激活之时。这才是人（而不是动物）的生活形式的特点。历史中真正深重的罪不是由于贪欲，而恰恰可能发端于人所独有的自由、权力意志和理性能力。

众所周知，从大脑解剖学看，希特勒的脑区发育可能比丘吉尔的脑区发育要更为健康，因此丘吉尔才应当是历史的罪人，但历史的事实正好相反（一个有趣的相关例子可以参看汪丁丁关于马基雅维利人格测验的讨论[1]460）。事实上，普遍同感能力在道德上既可以支持善，也可以支持恶，这是亚当·斯密早就指出的。人们因为具备同感能力而能同情他人的痛苦，但也正因为具备同感能力而羡慕他人的奢华生活，蔑视穷人、恶人，甚至因为同感能力发达而懂得如何更有效地折磨他人。斯密不用催产素和镜像神经元方面的知识就明白这个道理，做出了神经学上的新发现的学者反而应当重新考虑亚当·斯密的洞见。

三、自由与生活的含混性

尼布尔对理性和自由的善恶两歧性的认识令我们想到存在主义。萨特在其思想的早期集中关注个体自由。人总是倾向于逃避自由，因为自由带来的责任过于沉重，所以他们会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诉诸家庭背景和童年遭遇无须多说，向法庭申请精神病检查以获得无罪判定更是日渐普遍。但萨特坚持把各种论证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的理由都称为“自欺”（bad faith）。在萨特后期的思想中，他日益关注历史和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和约束，可以说这时的他更为“现实主义”了。然而，即便是这种政治现实主义也不能说就是否认自由。当然，自由行动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其他人的自由和现实条件也在发生作用，萨特认为这揭示了历史的辩证含混性和荒谬性。不过，尽管自由与“必然”交织为一体，尽管历史境遇对人的选择可能性进行了限制，人在政治生活中依然有自由。

自由的重要与心灵本体的独立性有关。人类源初的自我存在形式是“生存”(existence),它构成了一种“叙事”。每个个体被抛入世界当中,与他人共存。但个人从被抛入的既有条件出发,向前、向未来筹划自己(ex-ist),并走向过去,从历史遗产中理解自己和发现可能性。唯有在这样的操心(care)中,才有自由与必然,人才会遭遇命运并采取面对命运的态度。即便我们使用经济学的话语方式,人的行为也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而不是“有了原因就自动有结果”。相反,物的存在不是故事化、目的论化的,而是自在的。大脑毕竟是物,可脑科学家的本位转换主张(不是我在生活,是大脑在生活)却似乎让大脑接管了心灵或“人”原先所执行的机能。这是否会导致大脑成为心灵(具有目的论式的思考等等),从而使物的世界又重新“复魅”?要知道,从科技史看,自然界的“祛魅”曾是近代科学家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之后才得到的“成果”。

自由是历史的“意义”。人类历史有没有“意义”,学者还在争议。在此我们不展开讨论这个话题,只是指出,如果认为历史有意义,就必然要同意生活的意义在于超出简单的“活着”。活着、快乐和自由也许是不能相互还原的三种价值,这是海耶克和奈特等人都强调的[2]99-100。脑科学家是生物学家,而生物学家不能走出达尔文划下的圈子:变异与自然选择[8]93。在大脑—功能属性的模式中,所预设的“属性”功能只能服务于生存。生物学家总是不由自主地引用生物界的唯一“目的”即生存作为终极性价值标准:更加强有力地适合环境(的多样性和恶劣)和尽量多地复制基因①。然而,人类具有复杂的生产技能和理性能力乃至艺术和灵性能力,如果其价值仅仅在于“有助于更好地生存”,那人类史就几乎毫无意义了。事实上,自然史中有许多物种比人类更加成功地长久持存,比如恐龙至少有一亿五千万年的持存历史,而(文明)人类很可能只有几万年的历史(部分原因来自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但是,几乎没有生物学家包括脑科学家愿意选择作为一头草食性恐龙而生存。为什么?只能是因为意义。历史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自由”,即人类的超越性能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即立足于此。当然他所提到的自由是现实的、体制性的自由,他认为人类历史的意义就在于逐步实现这样的自由②[11]。古代东方只懂得一个人的自由,其他人都是奴隶,现代社会则懂得所有人的自由。努力去实现自由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自由,但如果不努力就不会有自由。个人自由在历史的长河中往往显得弱小,但它确实在历史中发挥着变异的力量,一旦变异稳定下来,就可能击破长久而牢固的传统习俗带来新的范式,此后的历史路径可能就会重新固定,在历史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时刻和事件。历史学家如果认为创立新范式的历史人物是被(其脑结构)决定的、不得不如此的,而不是因为他们敢于承担责任,决然打破因果锁链去追求新的价值,那么这样的描述势必有失公正,或者几乎没有意义。

四、结 语

我们在第一节提到了《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一书,事实上,虽然这部巨著在反思神经科学进入人文学的问题上有不少洞见,但它也有片面性。这部书立足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但维特根斯坦后期关于语言的基本观点是生活形式学说。语言是否有意义,要看它在一定的生活形式中的运用。没有理由说哪一种语言是唯一正确的,即“真”的(在反映真实世界的意义上)。

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启示结合起来。在多种多样的生活形式中,无论是还原论还是唯灵论的二元论语言,都可能找到自己“有意义”的领域。即便是最为科学所诟病的“灵魂”(实体、主体)的言语方式,在认真修行的人那里也是完全有意义的。一个人修行到放弃我执之

① 不过,食物链上的高级动物比如狮子,因为后代存活率高,并不大量生育繁殖。

② 当然,也有人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历史的意义不是追求自由,而在于找到归属,解决个体的孤寂,比如索尔仁尼琴。

后，空灵澄明的境界就会自然涌现。这是直觉，是经验。有的心智学研究者从未有过这样的经验，就认为不可能有，这是不正确的。或许科学家反感宗教，那么他们可以考虑一下文学。在文学叙事中，对“灵魂”的探讨是有意义的，比如史铁生在《灵魂的事》中的一系列反思。他说他相信这样的话：“如果你获得了整个世界，但是丧失了灵魂，又有什么益处？”脑科学家难道能说这种说话方式只是在表述一个幻觉？真实的说话方式难道应当是：“如果你的大脑获得了整个世界，但是丧失了大脑（的机能），又有什么益处？”这两个命题恐怕不是等值的或可以彼此还原的。

另一方面，在一定的生活形式中，我们确实就是我们的大脑，大脑可以说就是一台电脑，一部机器。比如在治病这一生活形式中，“人是机器”正是法国医生、哲学家拉美特利在 18 世纪就断言了的一个命题。又比如，在管理学和教育学等操控性知识中，神经学确实已经得到顺畅的应用。人类最近一次主导生活形式是所谓现代性（modernity），其主要特点之一就是现成化，在这样的生活形式中确实日益难以有灵魂的存在余地。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都是同质化的量度，这只能是可以进行公度性量度的效用（utility），而不是无法客观量度的灵魂或其他什么东西。韦伯在其讨论现代性起源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曾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指出最后世界上将只剩下两类人：无心的享乐者和无灵的专家[13]。可以看到，神经科学或者各种神经科学的人文学将会指向这两个方向。

先看“无心（heart）的享乐者”。无区别的快乐正在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终极价值。在一流的神经经济学家中，黄有光提出了一种“快乐机”的观点，他号召推广一种能够大量增加快乐的简单方法——刺激大脑享乐中心。只要在技术上解决了副作用问题，那么每日刺激大脑半小时，所获得的极大快乐就是人生幸福的主要内容[14]（黄有光的观点表明现代经济学在价值论上不仅倾向于快乐论，而且倾向于某种唯我论，因为把刺激大脑当做幸福之道，就意味着原则上不需要所谓公共领域乃至整个生活世界）。我们认为，这样的观点确实是现代经济学逻辑发展的必然，只是黄有光具备理论上的勇气和彻底性来系统论证和发表它。相反，有的经济学家认为进化的指标应当是质而不是量，并认为自由高于快乐，回避“体验机”的思路反而可能意味着逻辑上的不一致，违背了神经经济学的应有之义[1]283-294。

再看“无灵（soul）的专家”。科学还原论的一个自然结论就是“不需要灵魂这个假设”（就像某科学家对国王说：我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就科学而言，唯有可以观察的才可以研究，所以在科学中必然采取行为主义。人们或许认为，行为主义否认灵魂、意识只不过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方便假设，并不代表科学家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受。然而这恐怕不对。不少科学家不仅认为唯有可以被观察的才可以被科学地研究，而且认为唯有可以被科学地研究的才真的存在。这就是一个本体论立场了。据 B.Baars 回忆，在 20 世纪上半叶行为主义盛行时，许多“心理学家”确实感到自己没有“心理”感受质（qualia）。而当后来整个学术范式转变为“认知主义”时，他们的“感受”也随之变化了[9]。

人类历史的未来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参　考　文　献]

[1] 汪丁丁：《行为经济学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年。[Wang Dingd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Lectur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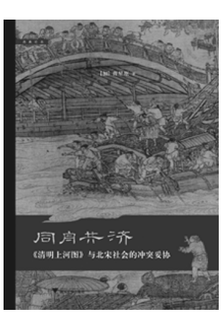
[2] [美]罗蒂：《哲学和自然之境》，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R.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trans.by Li Youzhe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3] [荷]迪克·斯瓦伯：《我即我脑》，王奕瑶、陈琰璟、包爱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D.F. Swaab, *We Are Our Brains: From the Womb to Alzheimer's*, trans.by Wang Yiyao, Chen Yanjing & Bao Aimi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1.]

[4] [澳]贝内特、[英]哈克:《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张立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M.R.Bennett & P.M.S.Hacker,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Neuroscience*, trans.by Zhangli et al.,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5]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by Xu Songyan et al.,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Plato, *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by F.M.Cornfo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7] Plato, *Plato's Philebus*, trans.by D.Frede, Indianapolis &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8] [美]埃德尔曼:《第二自然:意识之谜》,唐璐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Edelman, *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 trans.by Tanglu, Changsha: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2010.]
[9] S.Blackmore, *Conversations on Conscious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0] 叶航、汪丁丁、贾拥民:《科学与实证:一个基于"神经元经济学"的综述》,《经济研究》2007年第1期,第134-142页。[Ye Hang, Wang Dingding & Jia Yongmin, "Science and Positivism: A Review on Neuroeconomics," *Economic Research*, No.1(2007), pp.134-142.]
[11] 孙仲:《尼布尔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Sun Zhong, *R. Niebuhre's Realist Theory of Politic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1.]
[1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Hegel,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by Wang Zao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13] [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M.Weber,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by Yan Kewe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14] [澳]黄有光:《能够大量增加快乐的简单方法——刺激大脑享乐中心》,见《宇宙是怎样来的》附录A,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8-111页。[Yew-Kwang Ng, "A Simple Way to Greatly Enhance Pleasure: Stimulate the Pleasure Center in the Brain," in *How Did the Universe Come?* Appendix A,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08-111.]
[15] [美]约翰·塞尔:《意识的奥秘》,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J.R.Searle, *The Mistery of Consciousness*,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新书架·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　名:《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
作　者:[加拿大]曹星原
定　价:69.00元



内容简介:本书是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专著,作者从全新的学术角度出发,探讨了这幅名作的内容、风格、创作年代以及内在含义。在历时十余载的研究中,作者仔细考察了《清明上河图》中的诸多细节,联系神宗朝的经济与历史背景,深入分析了卷末跋文,并梳理了众多宋代文献。通过对画作内容的重新论证和对其成画时间与原因的考察,作者认为《清明上河图》试图表现在北宋中期社会风暴突发的背景下,新兴沿河市场的风貌以及变法与漕运带来的繁荣,同时表现了统治者"上善若水"治世观念和愿与民众同舟共济的精神。

作者观念新颖,论据充分可信,突破了以往从美术角度出发讲解《清明上河图》的窠臼,以深入浅出的方式给予《清明上河图》一个全新的历史定位,并作出了开创性的解读,为读懂这幅传世名作带来新的可能。

发行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浙江大学出版社　　**邮　编**:310028
电子邮箱:faxingbu2004@zju.edu.cn　　**电　话**:0571-88925591、88273163